

西北散記

第一輯

神祕的陝北

石利一
何撰
——
編輯
——
述

西北出版社發行

69.1.5
350

西北散記目次

第一輯 神秘的陝北

- 一 美麗的自然與艱苦的民生
- 二 毛澤東不做小官
- 三 共產黨玩的把戲
- 四 所謂「幫助農耕」
- 五 村裏的招待所
- 六 「特區」裏的「民主政治」
- 七 不吃飯只救國
- 八 一半生產一半抗戰

西 北 散 記 目 次

西北散記 目次

九 人窮骨硬的饑漢

十 所謂「統一戰線區」的作風

十一 陝北的青年大本營

十二 從陝北歸來的青年男女

十三 別了陝北「我不願做中華民國的野百姓！」

西北散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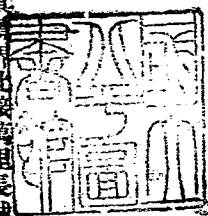
(一名神祕的陝北)

一、美麗的自然與艱苦的民生

西北俗稱「北山」，以大梁山脈爲主幹，支脈四出，縱橫盤互，其境界北接萬里長城，東連黃河谷地，南臨關中盆地，古謂「關中天府，秦川八百」即在於此。——爲洛水，清澗，無定諸水之所經，山勢雖不雄壯，水流縱不汪洋，但景物却也頗有可觀。

由西安到西北的延川，約有千里路程。二十七年七月十三日，我乘第二戰區兵站總暨部的載重汽車，離開長安古城，走上到西北去的漫長征途，汽車上載有十餘位同行的伴侶，及驅趕到前方軍用戰品，車在重山峻嶺危險峭壁中行駛，一回兒爬上高可千仞的高峰，一回兒降臨低可千丈的山谷，千里路程，艱而且險，或者我是一個舒服慣了的人，坐着汽車，感覺着比當空，塵土漫天，揮汗如雨，苦不能支。

途中山回谷轉，人馬甘泉到延安兩段途中，山勢雄偉，怪石嶙峋，野花如雲，綠草如綉，澗流潺潺，瀑布滔滔，山鳥齊鳴，猿猴長嘶，風景清幽宜人。除了這兩段途程之外



，其餘盡是荒涼不堪，既少村落，又無人烟，大地寂寞，沉沉如睡；但在這荒涼得不堪入目的原野中，却深深的使我感到自然的偉大，也使我感到靜默的興味。我是一個愛好自然的人，杭州的西子湖畔，北平的北海公園，我不願誇獎它的美，那是人工，不是天工，人工只體說是巧，而天工鉤勒，則是另有一種偉大雄渾的姿態。我的過去，生活在人烟稠密中的都市，到了西北，才開擴了我的胸懷，走入了我理想的境地，看到了這「大陸的海洋」。大自然，它向我微笑了，我向他低吟了。

共產黨為什麼選擇這樣一塊區域僻靜人烟寥落的地方作為根據地？我以為他們假使不是被迫無奈，或是上了引路人的當的話，那末祇好以愛好自然要來欣賞自然作為解釋了。然而這里却是很適合原始人類與其產生活的環境，要飽肚，可以上山打野羊；要燒柴，可以上山砍樹枝；要藏身，可以掘土打窖洞；要自衛，可以依山築堡壘；同時，又因為人口稀少的緣故，地無主，產無家，任憑把山削平，谷填夷，也沒人出來過問。在如此這些情形之下，祇須戰勝自然，便無生活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困難。共產黨或者因為這區域是適合試行共產制度的區域，所以便在那里招兵買馬，成立忠義堂吧？可是這其間我覺得不無缺憾的：是他們未能以羣衆力量，開發這遼闊的莽原，向自耕自食，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飯這一條路上走；他們還使那里的青年男女，以全部時間消耗在蘇聯化的「詩云子曰」里面；沒有叫他們執起鋤頭，開闢草萊，養成共同合作，共同消費，共同生活的實際精神；

他們吃的饅，還是向當地的老百姓買麵粉而雇工人製成的，他們的住處，也借着老百姓的窯洞，或以老百姓的氣力開成的；個人經濟的力量，在這個特殊區域裏仍然操縱着一切。

共產黨所佔據的西北共計二十三縣，是包括陝、甘、甯、「邊區」在內的，佔地二十萬方里，人口約有十五六萬。那里就地的人民，都是在這荒涼的環境中生活着。種的是山坡上的砂石雜壤的荒地，住的是破窯，窯內設土炕，進去之後，四壁黑如鍍漆，氣味騷臭不堪，吃的是小米稀飯，有時還滲雜鼠米與米糠，又粘牙，又墊牙，同時又有惡味。普通還有兩種特產：一、跳蚤，二、蟲子。家家的土炕上，幾乎都是蟲蚤世界，到西北去的苦難，除旅途上的不便之外，就是找不到住的地方，受不了蟲蚤的咀吮。苦啊！西北的人民，他們有時還和牛羊同住一個窯洞里。

據一個當地老百姓說：西北的人，到了四十歲以後，大半都患腿疼。病原是天天爬山，吃和穿，都需要爬山而得；天天跟着毛驢走，所以年紀老了，容易得腿病。我想，這也許是事實。

二、毛澤東不做小官

在這樣一個堅苦的地理環境裏，每一個人所認識的就只有他們日常住的窯洞，日常耕的山坡，日常用的毛驢，除此以外，乃係國家概念，民族意識，政治思想，他們是什麼都

沒有時，但是強悍的性格，誠懇的態度，沈着的眼光，健壯的體魄，刻苦的精神。凡是原始時代民族性的優點，幾乎都被他們保留着；這是我認為西北人民最偉大的地方；同時也是他們最神祕的特徵。

最奇怪的，是有一天，我住到延長縣柿兒嶺村（在延水南，沿黃河岸，距平渡關約十五里之小村莊，位於山巔。）的一個村長家裏，早上起來做洗臉刷牙的例行事宜，一個年有六十歲的老漢跑到我的面前指着牙刷問道：「這就是人家說的牙刷嗎？」而且帶着十二分驚奇的眼光看着我。我答以「是」並問他「是否見過牙刷？」他說：「只聽人家說，到城裏去還賣牙刷的，可是我沒有看見過這東西的樣子，現在才看見你用那東西洗牙，我想，那也許就是牙刷。」

由此可知西北人民對於物質生活的享受是怎樣的簡單，我幾乎害怕和他們說話，因為他們總是聽不懂一句通俗的話，或一個普通的名詞，而且他們認為是極通俗的話，我也同樣的不能聽懂，所以我認為這是最苦惱不過的一件事。

那一天早飯後，本來是起程南下，可是天下起雨來，山路泥濘，難以行走，我因此得到一個休息的機會。在西北，雨天是極難逢到的，農民們因為盼望着雨後的麥收豐收，自然也帶着和藹歡洽的容顏，每人抱着一枝旱煙袋，把原始人的野蠻容顏全都收去了。我也和他們坐在一起唱小調，談天，他們沒有吃過魚沒見過菱角，也沒有吃過橘子，我便專

給他們談這些事情，談得很會生趣，他們都歡迎我的講話了，我也分外的高興起來。

談到抗日，我便深問他們對抗日的意見，一個年約四十多歲的老先生便發言，主張「統一抗日」，「擁護毛主席」，「擁護統一戰線」，……洋洋大論，我聽了之極，未免奇異。想不到連牙刷都沒有見過的這些人，竟然知道這麼多的新名詞，我追問他「何謂統一戰線？」彼對以「聯合各黨各派，一致抗日。」我又詢以「何以知道這些？」彼對以「在延安開村民代表大會，聽毛主席講演知道，並且臨回來時，還告訴我們廣為宣傳給大眾。」由是我方知其為人民代表之一。我便開始給他們講統一戰線的理論，及對於抗日的政策，他們似乎有了些覺悟。在以往，他們對三民主義的認識，只知道三民主義就是國民黨，國民黨是不革命的，所以三民主義也是不革命，不革命即反革命；反革命的應該打倒。我問他三民主義所講的都是些什麼東西？他們全不知道。我便又對他們說了三民主義的梗概；並將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之區別及二種優劣分析了一下，把三民主義能救中國的認識打進了他們的腦子裏去。最初，他們像是有些不服氣，而且以為我所說的話毛主席沒有講過是否可靠，還有疑慮，但最後他們却承認三民主義是能救中國的，而中國國民黨並不是不革命與反革命。

一個老漢秘密告訴我：「你所說的話，我們知道是很對的，可是在三個月以前，有一個學生模樣的小夥子，在這裏講三民主義，被農村自衛隊的隊員抓去，活埋了。」我聽

了這話，心底起了異常的悵惘與感觸，低聲的回答說：「啊！我不知道有這怪事！中國人對自己中國人，也竟會像日本鬼子一樣的兇狠！」老漢不語，點頭走開。

到了晚上，那老漢邀我到他的鑛裏去休息，我是一個異鄉人，在一個陌生的環境裏，能找到一個向自己親近的人，是最安慰不過的一件事。從此我知道那老的是姓馮，名叫大中，我便稱他叫「馮伯伯」。他很歡喜我，晚上給我做麵吃，還給我做一碗乾豆角，乾蘿蔔，山葱等大雜燴菜，裏邊放了幾塊鹹兔肉。他養了一隻惡狗，我怕牠，不敢下坑，他遂把牠關到羊棚裏去。

躺在坑上總是睡不着覺，抗燒得有些太熱，烤的我喉嚨發乾，眼皮發癢，患痧眼的人，不能在熱的環境中生活嗎？老伯看我睡不着，又開始對我講起陝北的狀況來。談到邊區政府時，我便問他：「毛主席是不是擁護國民政府？為什麼要成立一個邊區政府？」他就痛痛的講出了下面的一段話：

「兩廳的他們說：——指共產黨——雙十二之後，毛主席就開始擁護國民政府，放棄共產主義，實行抗戰綱領的抗日政策，並叫我們宣傳停止戰爭，把「紅軍」改稱為「抗日軍」，把「蘇區」改稱為「統一戰線區」，召開了一個民衆代表大會，擁護「和平統一」、「停止內戰」，「各黨各派大團結」，「服從蔣委員長抗日主張」。但「蘇區政府」，仍沒有取消，改名為「邊區政府」。究竟是為什麼不取消，我就知道了。但曾經聽

好客人都說，是因為南京不給毛澤東官做，設若取消了「邊區政府」，陝北既不能成爲一省，更不能成爲一國，最多只能劃爲一區，毛澤東不但當不上省主席，而且最多只能當一個專員，像綏德的那何專員（何紹南先生）一般大，毛澤東覺得做這一個官太小，低了自己的身價，所以改立了一個「邊區政府」，坐「主席」。「主席」，除了國民政府的委員長，誰也不能比飽粗。」

我聽到這裏，不勝感慨；原來在陝北的民衆之中，並不都是連牙刷也不見過的人，毛先生的作風，瞞得住牙刷都不見愁的人，但對於知道牙刷以外的事務的人們的心里，毛先生免是不爲他們所懷疑了。

如果說毛先生不取消「邊區政府」的原因，是爲了不願做小官，那似乎是損毀了毛先生的性格，毛「主席」或者未必是那私慾滿懷封建意識議厚的革命者，然而毛「主席」何以不取消邊區政府？又何以雖然把「統一戰線」時時掛在口上，而一面卻偏偏要自立政府，不願且也不肯使國家的政權「統一」起來？我却找不到任何合理的解釋。

次日早晨，天氣轉晴，我知道那裏環境的特殊，且因另有工作，不願再停，便謝辭了那老漢馮老伯伯；臨走時，他熱誠的握着我的手說：「盼你早些轉回，回來時可在此多消磨幾日怕誤你的公事，不便強留，回頭見吧！」他那溫柔的臉，如今還印在我的心裏。使我永遠不能忘記的。像馮老伯伯那樣富于熱情而又誠懇又和藹的人，在西北這塊古怪的風土

裏，是很難多見的。在西北不管是男女老幼，甚而一隻山羊叫喊聲，都免不了硬腔硬調的，令人聽到之後感覺不快，這並不是我的牢騷話，其實他們並不會罵過我，更不會苛待過我，我會有什麼牢騷呢？不過風土培養成他們冷靜的態度，與生硬的腔調，因此在西北聽到一句比較親密的話，真是比山上種麥角還要難些。

三、共產黨玩的把戲

據一個農民告訴我說：「自從中國共產黨——紅軍——到了西北之後，西北的人民一天比一天的滑頭起來；」確實的以往時西北，東西兩村，雖「雞犬相聞」，而「老死不相往來」，父子夫妻如無正事相商，平常不多言語，女人坐在家中做些雞碎的事情，男子或耕或樵，或獵或牧，各盡其事，各務其業，日常的生活，就是這樣呆板的過下去，只有吃飯時候，不論大小男女，都圍在一個炕上，這是他們團聚的唯一時機，男女授受不親的禮教，在他們執行得更為嚴格。但現在却不盡然了。在西北，我聽了好些關於紅軍的故事。有一個故事是這樣的：陝北剿共時期，紅軍和國軍在交通鎮對峙，雙方軍隊各佔山嶺地帶，紅軍受了國軍的包圍和封鎖，餓得幾乎快要嚼草根了，他們把老百姓的東西都吃了個淨光。有一個姓的山東人，住在紅軍佔領的一個山頭上，把自己的一些食糧，偷偷的儲藏在兩個秘密窖洞裏，以免被紅軍知道。紅軍用種種方法，去向劉家要東西吃，今天去幾個

：「我們都沒有飯吃的窮朋友，有飯大家吃，有工大家做。」朋友又到那裏說：「我們都是一家人，彼此不分，你我不論……」可是劉家的老婆因幾次的經歷事實把她教訓的也罷滑頭了，不管他們說長說圓，總是好言謝絕，有一天，忽然被紅軍發現了他們儲蓄食糧的所在地，這可糟了！紅軍就吊了一個很大的手腕，把劉家的兩個孩子拉去當兵，把劉家老婆又派下山頭爲他們作偵探，借着這個機會，便把所有的食糧全部偷光。等到劉家老婆回家以後，他們對她說：「糧食是被國軍搶去的，要保護我們的生命財產，只有和國軍死拚」。他們一片的欺哄話沒有說完，這劉家太太已經氣的斷氣了，等到兩個兒子回來以後，紅軍又開盛大的追悼會，開擴大宣傳會，說什麼「劉老太太的殉難，精神不死，」好好的玩弄了一套把戲。但紅軍這些把戲，也終于是把戲而已，因爲老百姓凡是相處既久的，都知道紅軍愛玩把戲，所以那些把戲在民間並不發生怎樣效力。那劉家漢子的大兒子也咬緊牙關的說：「媽的！他們以爲我們不明白，是逼死我娘的，可是咱究竟不是小孩子，咱那會不知道嗎？……」

「共產黨到西北之後使西北的人民，一天比一天的滑頭起來，」這話是不錯的！人民受了共產黨的這些教訓之後，爲了適應環境，便不能不學滑頭；否則，他們便會處處吃虧，上當。甘泉，可說是西北最繁榮的處所了，市面上市意很熱鬧，物價特廉，無論紙煙，水果，布匹，海菜，都比西安便宜。抗大的學生和八路軍隨街亂跑，菜館裏，水果店，家

家都有人滿之患。我很奇怪，人人都說西北又窮又苦，八路軍和抗大的學生每月只有五毛錢的津貼，可是到了小旅館裏，我見他們許多有拿着大張的法幣五圓，十圓在叫「找！」的「這錢是從那裏來的？」我摸不着頭腦，想誰也摸不着吧？而且，除此以外還可以見到銀圓。據說，拿一百枚銀元可以兌換百二十的法幣。假使要土票子，——西北用的偽鈔——可以兌換到一百五十元。西北的紙煙，水果，海菜等，據說全是「走私」過來的，拿着銀元向敵方買貨物，把貨物賣成法幣，再兌成銀元，往返可以剝削好幾層利息。這真算是一份好生意！雖然用的是仇貨，但是倒還便宜！實利主義者向來是以投機詐財為妙法的抗戰以來，內地物價昂貴，私運仇貨，既可以供需要，又可以藉以漁利，在經濟學的原則上，這作風倒也說得下去。但同時：我還看到「民族利益，高於一切」的標語，分明還揭貼在各商店的門上牆和壁角上。我不知這裏所謂的「民族利益」，是怎末講？

在西北公路上，往往有些夜行的馬車繞道駛向西安來，說不定也是這些商販們。走私在中國不能澈底制止，確是抗戰建國中的最大遺憾，但是這個罪歸何人？令人難以辯解。西北的民衆組織，在形式上要算是最健全的了，在一個有健全的民衆組織的區域裏，對於私貨不能制止，未免證明了民衆組織的內容太為空洞。

「打游擊在西北，是一句最普遍的熟語，因為借着打游擊這名詞，可以做出許多好事情：要想吃東西可以到鄉村裏去打游擊；要想找姑娘，也可以到鄉村裏去打游擊，看中

了一個女孩子，就先叫人家「女同志」，和她們談上笑上一陣子，便嬉皮笑臉的溜之大吉，這也算打了一個大游擊。這種情形，我親眼看到過好幾次，但我並不感到刺目，而且又深爲西北人民樂觀。從此以往，因爲「打游擊」的功效，也許會使西北更有種種不可思議的進化和文明。

四、所謂幫助農耕

共產黨的所謂革命，即農民階級的革命，以解決農民的痛苦及地主的壓迫（？）爲號召；他們以爲中國是一個以農立國的國家，農民佔大多數解決了農民的痛苦，也就是解決了中華民族的痛苦，農民能夠解放，亦即中華民族整個求得了解放（？），話雖是這樣的說，但農民運動究竟是否真能解決農民的痛苦？究竟是否真能使農民求得了自由解放？口說無憑，只有用事實來作證明。我認爲不管別人說我是「真革命」，或「反革命」，只要我所作的事情是真正與民衆有利益的，我就去作，有時，雖然無益，最低也當無害；設若不是如此，任憑人家罵我是「反革命」，我決不去做。要知道「反革命」和「真革命」，並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就像我們看戲一樣，每見海瑞一出來，就罵「嚴嵩狗奸賊」，其實嚴嵩在背後，何嘗又不罵「海瑞狗奸賊」呢？這就叫「狗皮領子無翻正」；我們沒有來多談的必要吧。

在西北，每逢走到一個村鎮上，都可以見到三個或五個身穿灰衣的士兵，臂章上掛着『八路』兩個字；不消說，這當然是八路軍，但我感到非常疑惑：第一點，八路軍爲什麼分散成三個五個駐防？第二點，駐軍爲什麼不帶武器？第三點爲什麼沒有軍事管理和軍事紀律？因爲不是看到他們在樹蔭下抽旱煙，就是看見在牆角下談閒話，有時還和娘兒們坐在一起，做針線，說笑話，固然，我們在別處到過軍隊有時也休閑的，但最低是要衣冠整齊，姿勢端正，一舉一動，不失軍人模樣；因此，我的好奇心又在開始活動起來。當路過宜川某村時，就問身穿灰衣者的究竟，一個『八路』青年告訴我：『我們是革命的八路軍，幫助農耕，替民衆謀福利，爲國家增生產。』我知是之後，上前使了一禮：『謝謝同志！你們太辛苦了！你們太好了！能夠恤民困，親身幫助農耕，增助戰時生產，真是模範軍人中之模範軍人！祝你努力！並工作順利！』我的內心，確實受了極大的感動！並確以八路軍是一個革命的軍團，抗戰軍人，假使都能如此這般，則民心順服，寇何足懼？所以當時就對『八路』青年說了這一翻恭維話，感嘆而去。

那天晚上到了一個小村子裏住下了，我們都不是講究人，炕上睡一些，洞子黑一些，都沒有關係，好歹只一宿，出門旅行，當然不比在家裏方便；同時，到陝北旅行，根本找不到好地方住，因爲他們窮得實在太可憐，吃的一大半是『苦』葉子。這種野菜，在別的地方沒有聽說，只有在陝北是很普遍的一種植物，共產黨有時拿這東西當飯吃。一雖

然是野菜，味道倒頗可口；『山葱』，像是小白菜一樣，據說烹大肉很好吃，所謂『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山地的生活，一般認為是苦一點，可是倒比平地的生活容易維持。這原因，是能自野產以資糊口。吃了一頓苦飯，給房主兩毛錢，他高興極了，買了兩個大煙棒子和我吸幾天。陝北抽大煙的風氣，比關中陝南都要盛行，而且煙價又廉，沒有禁煙局和官膏局；並且還有八路軍的熱心提倡，所以風行無阻，那些『幫助農耕者』，尤其抽得利害，這更足說明他們提倡的熱心。

談到幫助農耕問題，算是首次掀開了西北的『神秘』之箱，裏面所裝的貨物，全都被我認識清楚，任憑怎樣用好話來掩飾，我此後再也不相信那套把戲。悔當時不該對那位『八路』青年說了一套恭維話，原來他們都是『口是心非以狼作羊』。記得河南開封，有一個相國寺，——又名中山市場——就像西安的民樂園，那裏有許多賣『假古董』的，明明是明朝的磁器，作爲了多賣些錢，便強調奪理的說是『宋磁』，有些古迷，往往閉眼睛近視而上了這個大當。我希望近視的人們，不要再上『幫助農耕』的當。

幫助農耕，在『八路』，在陝北，其實並無此需要；因爲第一，上面已經說過，西北人民吃的食料，多半是『苦』，此物本是野生，既不須植，更不要耕；第二，陝北可以種植的地方，隨便撒下麥子，以及其他種子，便能自然長大，最多種了後下一次肥，便的地方可安待收穫，也無須耕；尤其不需要天天耕。可是『八路』，却偏偏要幫助人民農耕，而

且幾乎是天天，不管人民要不要他們幫助。這原因，是因為『幫助人民農耕』，在『八路』可以有兩種好處：第一，是吃飯不給錢；第二，是可以控制民衆的言論行動，免得他們反對共產黨，這就是所謂共產革命的新政治手段。假使明末的崇禎皇上，能有這麼一套，什麼張獻忠李自成之流，決不會率民造反，直下皇城，逼天子自縊于煤山。在秦始皇時，曾經焚書坑儒，收民間五金錢成金人，以圖防範內亂。這手段已算高明無比，但是終究擋不住高祖斬蛇起義，率民興師，共逐暴君。由此看來，不行正事的人，往往是口說好聽話，以假作真，日夜枕席不安，尚恐防患不周，但終究會水落石出，爲天下人所共棄。以口唱『自由』者，而監視人民之『自由』，口唱『民主』者，而實行『無限的專制』，口唱『增加生產』者，而以『求得消費的材料爲目的』，尋求可以剝削的對象；人民能無怨言？據聞：在陝北，活埋百姓，剿滅家室的事實，時時有之，但統制過嚴，一般民衆，忍氣吞聲，而不敢言敢怒，敢怒而又不敢明怒。以前有人說這麼兩句話：『淚向心裏流，面喜肚裏愁。』這是可以拿來形容陝北民衆所受的生活之痛苦，他們現在，正體味着這種的滋味。

五、村裏的招待所

不惟在特區的政治形態與組織機構上含有一種特殊的風味。舉凡一事一物，甚而毛驢子拉的大糞，均與一般不同。我記得在蒙鄉——河南——的驢子，吃的是稻草，麥稈，小

米穀，再滲上一些麥或穀，——磨麥剩下的皮子——所以拉出糞來，像是正月十六煮元宵一樣，又圓又黃，臭味薰人，而在陝北，驢子滿山亂跑，渴飲溪水，飢食野草。拉出糞來像是陝南鎮安一帶人民吃的青菜糊湯——一般稱為稀飯，用玉米麵拌以野菜，糞而食之——一樣，又稀又青。不過臭味還少；這是事實，並非筆者故意描畫；而且這裏面也含有確切的意思在內：第一，大家知道陝北接近內蒙，不久以前，人民尚近乎游牧生活，而富饒的特點是山水縱橫，水雖不大，而每一山峽，均有清溪潺潺，可資畜飲之需；山雖不高，但多土質肥壤地，雖不種耕種五穀，而野草叢生，可資畜食之需；因地廣人稀，耕地雖然不多，但以足敷人民耕種，因此陝北雖水草從豐。而生產方式，已早由牧業一變而成農業，農畜之類，不用再喂以稻草麥桿等即可野食而飽，故驢子之滿山亂跑，飢食野草，正是農物利用，減輕農民負擔，人力物力，均可額以節約，第二，是因為陝北太窮了，地土雖廣闊，而生產並不豐裕，就量而言，困氣候關係每年種麥只能收一季，山地每畝能收五十斤就是很好的收成，而其繁殖之費力，每畝相當五畝之多，所以，人民費力大，耕田少，收穫少。這樣，怎麼能不窮哩？每年收穫平均要分不敷于消費，而能自足自給之戶，便是當地的一財主，要算從寬裕了。山地每堆（每三堆合二畝地的樣子）價值兩元，其價之廉，即可想見其生活方的一般。所以『陝北太窮』，這話並非虛談。加以，抗戰以來，人民的負擔過重，『救國公糧』，『抗日稅捐』等玩意，把老百姓玩弄得更為窮困。

，收麥子做公糧之用，大麥豆子之類，在南方本來是用以畜食，但在陝北，連人也不容易吃到嘴裏。由此則驢子的生活爲人民剝削了，人民的「被」剝削了。所謂「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螞蟥，螞蟥喝水，水乾魚盡。」陝北人民之所以窮苦之最大原因，卽在于斯，而陝北亦亦之最大危機，也卽在于斯。甚于以上兩點，驢子以『大自然』營生，真是合理無比。

在南方，沒有錢的人，寸步難行，但是到了陝北這個窮苦的環境裏，比較還算好混，只要你能有一技之長，到處卽能受人歡迎。原因，是陝北的文化過于落後，人民的生產方式，也特別笨重。生活技術方面，更是魯鈍不堪，經商的人，多來自關中，陝南，山西，河南等地；其中尤以河東人爲最多，地方經濟大權，都不在當地居民手裏。有一天，我在延長及定川一帶，遇到九個打鐵的匠人，專做犁，鏟，鏟，耙這些農業生產工具，其中有三個是溫國人，二個是河南陝州人，四個是河南盧氏人，他們每年二月由故鄉起程到陝北去做工，到四月小麥成熟之後再回家收獲，他們做工的區域，無形成了額定的農民需要的工具，根本無從購買，每年一到二月，就專等這些工人去爲他們製造，他們自己根本不會製造，連鐵錘，更敲不上，一生進過一次城的人，幾乎算是很難多見，所以他們處處都具有原始時代的特質。在南方比較笨一些的人，到陝北便算多智多謀，精幹有爲，所以南方人到西北好混的原因，就是生活本領上，生產技術上，比陝北人高的多，能有一技之長

，就可賺錢無量。

在這樣一個環境裏，旅客們一定會感到兩點最大的困難：第一，是住所問題；第二，是吃飯問題。因為這裏既無飯店，更無旅館（在農村裏，城市當然例外。）交通又不便利，而縣城與縣城之距離最近者多在百五十里地以外，每天爬山過嶺，最多不能超過八十里的行程，設若沒有汽車可乘的話，想往城市，很不可能；因為旅途之中是以趕程為唯一目的，例如由甲城到乙城相距一百八十里的話，第一日走八十里住在村裏，第二日亦然，等三日到乙城只走二十里，住宿太不值當，只好繼續前進，所以仍須住到村子裏。這樣，住村的機會比住城的機會多，所以住所，吃飯，當然會成問題；可是，因為在陝北有一種特殊組織，所以打破了旅客們的極大難關。——「食住」——這種組織的名稱，就叫「農村招待所」。專以招待四方客商及旅人遊官；這是我在陝北尚感稱意的一點，同時亦不能不歸功於以善長民運工作，及民衆組織自衛的中國共產黨。

農村招待所的住持人，是當地的村長及「幫助農耕者」的士兵，有時也由農村自衛隊負責，旅客到村住宿，必須經過再三盤查而後，才能留宿；並且必須持有正式路證，否則，須有當地農民担保。凡蒙招待者，有錢就須照食價出錢，宿費隨意償付，住所由村長負責尋找，食品由當地農民均攤，但是旅客納費之收入，也照原價還給農民。若是沒有錢的人，只要你亂隨風倒流，爲其主義歌功頌德，他們也便樂意設法，予以招待，派到比較有

錢的人家，供食給住，命令一經下去，農民絕對服從。假使他看清楚你不是有此傾向的人，那便很不容易，縱然蒙其招待也須受其監視，不讓與地方民衆接近。原因有二：一是怕作反共產主義的宣傳；二是怕陝北人民向旅客吐苦，揭破其在地方行政上的一切黑幕。這種隔離政策，爲封鎖消息及控制輿論的絕妙方法，自然，這在共產黨有很好的解釋的，叫『防範奸細』，不過在這樣的『防範』之下，除了漢奸以外，其他政黨人員，在西北便也很難與民衆接近，而且在『防範』之內一切不能有所活動了。或許有人會批評他們組織招待所的動機，頗不純潔，另有其他作用，而『漢奸』，其實還不是他們所『防範』的對象，然而這祇有天知道了。

據說：有錢的人住招待所容易上人家的當；錢少的話地容易遺失，錢較多的話容易招搶；錢最多的話，又容易傷命；這話我認爲是不大可靠，我每次到西北最低都帶有二百元以上的金錢，數量雖不算多，但卻沒有招過一次小禍，間或有這樣的事實，也不過是偶然的事件，而絕不能說是『必然』的。不過也有這道理在裏面，就是有钱的人，多半是些奸商行賈，遭人這種毒手，也許是前生的修道不良，這生的行爲不善，他們祇該抱怨自己的不是；同時，我又發現了一種事實，就是主持招待所的人，禮義方面，有些欠缺，說到『禮義廉恥』，他們並不說是『國之四維』，而說是『封建社會的舊禮教，無甚講究的必要』。話雖如此的說，不過這僅僅是人家的革命理論。言行不能一致的人，到處皆有，所以

雖然有不諳『廉恥』的理論，但也未必就會真有不諳『廉恥』的行動，設若真的話。『言行相敦』，也稱得上好漢，足夠我們欽佩。

在過去沒有『農村招待所』時，我想到西北去旅行的人，不知會感到多少旅途的困難，可是一個人告訴我說：在共產黨未到西北前，根本沒有少許到異鄉人士，及至共產黨到了西北之後，爲了歡迎外人到西北觀光與旅行，才有農村招待所機關的組設，以予到西北者以便利。最初是在西北公路沿線的各縣份設立，例如一般向西北跑的青年男女，都多借以投宿，而且青年是他們招待的惟一對象，所以凡是到西北去的青年男女，在未到達以前，已經使他們對西北感到無限的美滿與贊嘆，不過一到延安進了學校之後，那可就不敢說了，這不能說不是共產黨對吸引青年的高妙手段，所以一離開青年于西北歸來以後，多數並沒有替共產黨歌功頌德，而相反的，卻是暴露其真相，原因在：他們以前所見到受到的，是表面的，而以後所漸漸知道的，則是其內幕了。

六、「特區」裡的「民主政治」

西北的範圍，異常複雜，除陝甘寧邊區二十三縣之外，在鄰近各縣，也有被共產黨所佔據的地方，淳化被佔地帶約佔全縣面積的五分之一；耀縣亦約五分之一，在西北山一帶的荒山深谷裏，也建了一座瓦崗寨，名爲『淳耀縣政府』，原地名係安社鎮；宜川佔去五六兩

國府另立衙門于古羅，此外在拘邑設有赤水縣政府，宜君的店頭鎮一帶，也成特區的勢力範圍，以往的三原縣雲陽鎮，也曾經一度做過「特區」，而且辦有雲陽青年訓練班，現在是已經收復了。所以特區政府的組織，像是菲律賓羣島國似的錯綜複雜，這也可以象徵着他們政治組織的特殊風味之一，無怪稱爲「特區」。

我們要知道特區的政治是否合乎民主？必須先知道特區的行政組織形式和系統：

西區中央——特區政府——西北省政府甘洛省政府（每省府下設有三個專員）——縣長——區長——村會長

這個系統與保甲組織是決不相同，雖然毛主席一口咬着說特區是國民政府領導下區域，但在行政組織上仍脫離不了「特」字派頭。黨（共產黨）的組織和行政組織平行並列，相輔而行，和國民黨無甚差異，所不同者，即特區官吏，上由毛主席，下至村會長，盡清一色的共產黨員，辦黨的人更不消說了；例如共產黨領導下的民衆運動裏的婦女隊（以西北婦女聯合會爲大本營），民族解放先鋒隊（業經中央明令解體），自衛隊（多係地方團隊），少先鋒隊，兒童隊，工會，農會，商會等團體；莫不爲中共清一色的包辦了（這總算是一條線嗎？）。不惟不許可國民黨員主持，連非黨員也決不可能的處於支持地位。所以這清一色的包辦真是清得透底。所謂民主政治的實施，在形式上，祇一種開會，所以開會在特區裏算是家常便飯，而且又是最關緊要的一件工作。鄉會每三日開一次，區會每

五日一次；縣會每月一次；不管是男女老幼，寒暑農忙，風雨無阻，一律出席，不得有誤；否則，以『反革命』『托派漢奸』等名詞論罪。老百姓誰和自己的生命有仇，所以不無含淚到會，聽共黨同仁，大吹而特吹其牛嘴。

談到黨的領導工作，更是『一把抓住』。因為官吏都是黨員，『叛黨即叛國』，口號又執行得特別嚴厲，而凡被委為地方官吏的都是黨內的積極份子，其行政工作即為其黨工作，黨政一家，絕無枝節，每在開會的時候，黨員必須化裝參加，以掩民衆的耳目而探聽民衆的言論意向，並煽動其活動。領導婦女隊與黨員，即化裝為家庭婦女樣式，領導農工與黨員，即假以農工裝束，自稱為婦女代表及農工代表，其實並沒有經過婦女和農工的正式選舉手續，這也算他們代表了民意。民主何在？如此而已。在開農工大會的時候，一部份共產黨員，都化裝夾雜于農民之中，一部份共產黨員提議，一部份共產黨員便高叫『通過』，妓在這種民衆大會之中，根本沒有人會說『再表決』，更沒有人會表示反對，而共產黨則說：這是『採納民意』。民主何在？其形式精神，實施辦法，即都在于此矣！這是共產黨所謂『實施民主政治』的一般辦法。隨時隨地，特區的『民主政治』，都是如此施行的。

至在那裏所謂『實施民主政治』的特別辦法，則是強迫民衆，滅網亂倫。在甘泉縣的某個村子里，據說有一天，召集××運動大會，通令全民參加，監究異常（？）。有一

僑者靳某，年踰六旬，粗通儒學，略知四書，性情較之普通人，稍馬古怪，對於邊區政政所講究的父子無分，男女不諱，總覺是『人心不古，世道日非』，滿腹牢騷，無以為訴，因之，平時每次開會，多由其子參加代表，抱『伯夷叔齊，恥食周粟』之精神，置時事于不聞，世俗于不問，但是這一次開會，既令全體參加，老者何敢反抗？祇得勉強到會，正在進行開會之中，及時事檢討一項，其子發表言論，一句句都是『中共革命』，『路線』，『戰』，『抗派漢奸』等新名詞，老者着急而呼其子之名曰：『××子（西北小孩子的乳名後多加子字）！何必多言？就擱時候？』共產黨員即當面以兩大罪狀責斥之：『第一對自己的兒子，不應當拿出父親的尊嚴！這是舊禮教的遺毒，我們是革命的人物，必須破除，以後稱自己兒子，務必要稱『同志』，父曰『老同志』，子曰『小同志』；第二，開會時候，言論自由，不管有理無理，均須讓人自由發揮。總括的說：第一是講的『平等』；第二是講的『自由』。而且據那次集會中的共產黨主席所云：『孫中山先生所講的平等自由，這就是這個道理』，這一套話把老者氣得目瞪口呆，回而嘆曰：『革命到了今日，綱常倫紀亂矣！人世焉有寧靖之理？』

革命而無父子之別，殊屬不近人情，而曲解『總均之平等』為無父子之別，更為誤以千里。共產黨以不近人情的違反民衆意志的套語理論，故意假託之于他人之口，其用意，更為險惡；蓋在減低民衆對於『總理之信仰』，且藉引起民衆的反感也。可是『總理平等之說』

，是否無有父子之別。這是閱讀過總理遺教的人所盡知，無須再加贅言的。所以一般民衆以及多數青年，于再三的受了共產黨的影響，知道共產黨作風以後，便都對共產黨老大不滿，而且忿忿然了。原因在：他們往往內受欺而上很大的當。

對於「老同志」和「小同志」的區別，我想起一樁故事來：我由郿縣僱毛驢赴洛川，我問驢夫：「你姓什麼？」驢夫答：「姓我老漢共四口人。」我問：「是些什麼人？」他答：「一個老同志，兩個小同志。」我問：「女同志和小同志都是什麼人？」他答：「女同志是我屋裏人，（妻子的意思）兩個小同志都是我的娃子（兒子的意思）。」我問：「對自己屋裏人和小娃子講什麼要稱同志？這樣稱呼好嗎？」他答：「唉；不好又怎麼樣？這是紅軍的規矩，開會時小稱同志就要受譴責，在家裏還是馬馬虎虎，自古的規矩，一下是換不過的，不過當着紅軍和外人就要稱同志。」不唯如此，我每次在陝北道上所僱的驢夫一向是稱我爲「同志」的，但是到了洛川以南，我就由「同志」一變而被稱爲「先生」了，這原因，因爲是已經出了「特區」。

七、不吃飯只救國

特區之所以神秘，是公開的神秘，凡是神秘的東西，都在公開裏隱藏着。例如：以上所說的農村招待所，幫助農耕，這不能不算公開的事實，但其所隱含之神秘性，更甚于

一切不公問者。漢奸的組織最嚴密，可是一般人都可以猜到他們所弄的是什麼把戲，——無非是破壞抗戰，獻媚敵人，出賣民族。——而且都可想到制止或防範的方法，不容他們公然無拘無束的幹去。凡是少有民族觀念國家意識的人，就不會睜大兩眼，去上他們的毒當。但是，公開的神秘，却最令人難以測想。許多高級的智識份子，就不能猜透這個謎，而且還不問青紅皂白的來譏謔這個謎子的奧妙無窮；甚而自以爲「世人皆濁，惟我獨清；世人皆醉，惟我獨醒。」的那些現代屈平，也會不清不醒闖入這個「津迷」。這是功呢？還是罪呢？這個神秘的謎，在未經揭破以前，萬人的耳目，可爲一手所掩盡，但如若一經揭穿以後，則大家都會搖頭嘆息着說：「不過如此而已！」

在特區最接近現代的城市，當然是延安，論其人口在其產來到陝北之前，總共不過兩三千人，市面零落，境地蕭條，其繁榮，尚不及于洛川，談到文化民智，更爲望塵莫及，但自其產黨到了陝北，由荒城一變而成紅色的皇城，學校林立，大兵逼境，商業因以繁榮，氣象因以一新，于是，所謂「活躍的膚施」等文章大吹大擂的產生了。延安現有人口數萬，貨羅全球，國貨仇貨，汗牛充棟，生活程度，較之西安爲低。查其原因，是因爲共產黨是受窮困受怕了的，所以不管仇貨不仇貨，一律門戶開放，大量輸入，並特別給予運輸上之種種便利，至有延安今日之繁榮，這不能說不是共產黨改善人民生活的一點，在往日海菜鱸魚之類，似與陝北無緣，終年不相來往，及至今日，市面小巷，小攤門面，均不

其物。大的飯館，計有六七家，「多爲共產黨主辦，現在也許更多了。」每天尚不敷市面之消費。我所見到的八路同志，莫不有「英雄好酒」之氣象，坐館談天，肥吃痛飲，一化就是十多元。

但是特區一般的人民生活是不是真正改善了呢？這話很難有具體的答覆。我們都知道共產黨改善人民生活的第一個口號，便是「免除苛捐雜稅」，就是廢除政府所規定的一切稅捐，但苛捐雜稅（？）免除了——派到陝北的各縣縣長，多因爲共產黨的抵制壓迫，只能管到三尺門裏，不能開到三尺門外，所以一切稅收，根本無法徵收；人民減去了國稅的負擔，在生活上雖然是較優一些了，可是被改善了的人民生活，實際上是苦得要死！因爲共產黨的「免除苛雜」，只不過是免去了人民對中央政府所納的捐稅，但借着救國的名目，派戶攤派的捐稅——救公糧，却徵無定時，而且徵無定則，徵收的方法，完全視其從心所欲，既無預算，也無報銷，大致採用累進率，有一石之收入者，大約征收百分之二至五，有十石之收入者，大約徵收百分之十至二十；甚而有時漫無節制，隨意敲詐，或毫無條件的收沒；而且如此收沒，不止一次兩次而後止，也許兩月一次，也許三月一次，時期不能一定，所以弄得民糧皆是公糧，百姓多無私儲，只有共產黨都有了飯吃，而人民則還要餓着肚子。可是，陝北的人民，對此不敢公然有所怨言，因爲，一發怨言，便是不救國，犯了抗日救國大罪，可以處以死刑。這究竟是救國還是禍國呢？

其次便是抗日救國基金，其抽法較之救國公糧稍輕，有一定的成數，例如每人每月收入一元，即抽去二分，十元抽出三角，百元抽出三元，餘可依此類推，據說這筆款是儲作國庫之用，這筆款子究竟是否專款專用，我們暫時不去管他，再其次還有歡迎捐優紅捐，慰勞捐，優待捐等，歡迎捐是專門招待紅軍各方要人，每逢要人入境，莫不大吃大喝，儀式隆重，否則該款即無法報銷，優待捐是優待紅軍將士之用，慰勞捐是優待紅軍家屬之用；至於優待捐等，均係活動費雜支之類。除了救國公糧無定期無定額的沒收之外，其餘的一切苛捐雜稅，最低可以剝削人民生活十分之三，而且都是法定，其餘諸如雞羊牛驢稅，更是駭人聽聞，隨意抽納，無人敢抗。所謂「廢除苛捐雜稅」的把戲，原來如此。這不能說是一件公開事實中的神秘吧？

此外談到改良人民生活的方式，就是人民替抗日軍人家屬耕種的事。說到這事，本來是義不容辭，理之當然，國民政府本早有優待抗戰軍人家屬之明令辦法，不過在特區裏又較之一般不同，其特點，即所有壯丁，早經抽作八路軍，所餘者，無非老幼殘廢之人，換句話說，就是已經不能爲共產黨擴充兵額者，便強迫（在他們說是一種農民運動，並非強迫）他們去替抗戰軍人家屬耕種。其實，他們自己的土地也正荒廢着，那裏會真正賣力呢？如此兩歧不願結果徒使西北熟荒遍野，生產大減，人民痛苦舉目俱增，這是特區改良人民生活成績。

所以，我們對於陝北改善人民生活的結論：「不吃飯，只救國」。任憑人民有飯吃無飯吃，而特區的一切加捐，則是必須繼續的，所謂「廢除」，僅僅是廢除了國民政府的稅收，而並廢除了人民對午稅捐的負擔！「只說漂亮話，不做光明事」，「這幾乎成了共產黨的貫的作用。

八、一半生產，一半抗戰，

從寫西北狀況開始到現在，我始終沒有把陝北的生產，介紹給大家，這個原因是我不是一個研究經濟的人，不能把西北的經濟眼光來透視陝北。我在西北除了看到一些荒邱廢墟崇山峻嶺之外，似乎再沒有別。其實，陝北的生產狀況，我始終認為西北太窮，人民太苦，他們的生活狀況，陝北的南山、商南、商縣、商安、柞水、華縣，尚屬頹唐莫及。陝南的山，可以辨別出許多地名之曰為「薯」——玉蜀黍、大豆、甘藷等食品，石山半腰，又多採樹及桐漆等。陝北的南山，在平靖之年，足可賴以自給，生活並不十分艱難；尤其山下泉邊，氣候溫和，雖在南山各縣，可是在西北，青山遍野，都是些無名怪木，除了燒柴之外，沒有別的用途，且因氣候寒冷，果品極少，農民除了些小米粗糧之外，麥子並不多見，大米更屬稀少，小米每年收入，尚不足以自給，農民的生活，如何能不艱苦？

西北在農產方面，除了延長，延川，綏德的大麻，算是大量的出產之外，其餘都是些零碎雜雜的出品，小米比較算是主要的食糧，大豆，玉蜀黍，小麥，蕎麥，高粱，扁豆，大麻子等，每種都有點把兒的收穫，棉花我記不清楚有沒有。其副產品，則以小羊爲最多，西北居民，因其地理環境上多凹形谷地，叢生野草，不宜耕殖，可養畜牧，故羊的出產，著于全國，牛，馬，豬，驢，騾等產額則不多。西北之羊，據當地人稱：從前平安之年，每家都不下三四十頭，每縣最低亦有十餘萬頭，但是近數年來，因軍事及政治上之特殊原因，人民不能安居樂業，遂使畜牧大受影響。人民的羊，都被以前的紅軍吃去了，現在除了山谷偏僻之區，牧業如常之外，一般民衆，多半放棄了牧畜生活，以免無故受到騷擾，所以羊的產額大減，每縣多則三五萬頭，少則一二萬頭。附產羊毛，三邊爲最佳，每百斤約可值五六十元，產額每年達五十萬斤，也可說是西北最大富源之一。蘭州等處的毛質，較之三邊稍遜，但產量較豐，每百斤可值三十五元至四十元。此外還有一種胎羊，價格最昂，價值最佳，西北的毛皮，每年輸出額，經鎮川堡，安邊堡兩地者，約五十萬斤；由榆林輸出者，二萬餘張；三邊之羊皮一項，每年達二十八萬斤；榆林的駝毛，年產約六萬斤，羊絨四萬斤，陝北在經濟方面，幾乎完全操縱在毛皮產額的出口，所悲觀者，卽今日之毛皮產量，已大非昔日所能比了。

由以上這個簡單的調查中，可以看到西北的人民生活，尙在農業社會和牧畜社會之間

，名義以農業為主，但其農業生產量遠在牧業生產量之下。自從抗戰以來，毛皮出口不易，近有軍惡劣份子，往往謀利通敵，多將西北之毛皮由軍渡一帶運往太原，轉運平津，賣給敵人。在此戰時物資原料缺乏，國內尚不足以自給，反而資敵謀利，實在使人遺憾；此爲我政府當局應嚴加防範懲處者。

其次就是西北的礦產，我們知道，西北的煤油，在宋代已發現油苗，據近代專家之調查，北自綏綏，南至同官，西至安塞，東達黃河，寬長三百餘公里。在延長，延川，膚施，甘泉，鄜縣等處，油床計有三十餘所，但仍未加詳細正確之統計與調查，無從知其藏量與究竟，榆林、橫山、神木、膚施等處，均有煤礦，但煤質較同官爲遜，除此還有宜川的硫磺，榆林、綏德，米脂的灘鹽，產量均有相當富饒；在工業方面，比較著名的，如榆林、澄城，蔚州之毛織業，橫山的軟皮，以外再沒有別的重要工業出產了。

抗戰以來，中共服從中央，宣稱願爲抗戰建國及求三民主義之實現而奮鬥，中央本寬大爲懷之精神，收編紅軍爲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每月撥付軍費××萬，中共經濟來源，自較充裕，每個士兵理應按照國民革命軍之規定發餉，地方人民之負擔亦應較前減少；可是在事實却非如此。八路軍在晉作戰，收沒富人之食糧，充作軍糧，而又向人民捐取消國捐，而西北的民衆，則養一豬一羊一牛一驢，亦不能自主，秋麥收在屋內，而不能自食，這種種的忠義堂時代的政策與作風，在八路軍是叫做『一半生產，一半抗戰的』。

我們以爲三者中的地位，來作公平的評判，對於目前邊區政府所唱的『一半抗戰，一半生產』，實質上實在等於『一半抗戰，一半消費』。因爲他們生產的對象不會注意到西北資源的開發與工業的改良，而只注意到農耕的食糧生產，在『所謂幫助農耕』一節裏，我曾經過一個詳細的敘述，就是每一個村莊，都經常的住着軍隊，在那裏幫助農耕，增加生產，事實上這是不很需要的。因爲西北的地土，適于耕種者十不得一，人民之數量，根本超過了可耕的田畝，故人民之所需要者，是能在耕種之外，另找生產之路，來補助他們生產的不足，並不是需要以人力來幫助他們的生產。更因爲這樣，幫助他們農耕的結果不惟不能增加他們的生產，而且增加了他們的消費。理由很簡單，就是在共產黨到不會幫助他們農耕以前，收穫雖少，但只有他們自己消費，到了共產黨幫助他們農耕之後，收穫仍少，而且又加上了幫助農耕的消費；結果，是生產沒有增加，而消費已經擴大，人民的生活，豈非更不充裕？

西北的礦產和森林，如能大規模的開發出來，可以彌補西北農業生產的不足，而且在經濟的收入上，可比勒索人民的血汗所到來的數字也一定要大上幾十倍，富國利民，兩全其美。這樣的作法，才算真正合於『一半抗戰，一半生產』的原則，而且，個人的意思，以爲必須如此，才能對目前的抗戰建國的工作，有極大的幫助，發生極大的作用。至於邊區何以不從這一方面着手而要就效率低微一方面去做，那祇有主持邊區的人，自己知道了。

九、人窮骨硬的鐵漢

出宜川城南十五里，有程落村，屬宜川人烟較密之區，村落遼闊，風景美麗，我因閒暇無事，曾往散步消遣，見兩岸花香樹茂，垂柳如蓬，時大雨初霽，氣象新穎。人民或耕或牧，自在逍遙，村中有一關帝廟，廟房共十餘間，內設保學一所，學生約三十餘，教師何先生。延長縣人，年約三十餘歲，因逃避紅軍之亂，流亡到此，家中除二子一女攜出外，餘悉為紅軍所害，我與彼相談約三小時，在此三小時的談話中，我知道何先生現是一個極窮的人，每月祇有十五元的生活費，連飯都不能吃飽的教書匠，現在他雖然是如此窮困，可是骨頭還是很硬的，不受金錢的收買，不為勢力的屈服，為黨為國，堅苦鬥爭，我認爲他的歷史是有一說的價值的，所以，今天要特別把這位人窮骨頭硬的鐵漢的史略，介紹給讀者諸君，以作我們立身的榜樣。

何君原任延南（延長，南施二縣）保安大隊隊長，紅軍竄入陝北後，曾自南施轉戰入延長，由延長轉至鄜縣，甘泉東北，最後退至宜川北部之羣山谷地，計與紅軍苦鬥。共二年計，所受艱難困苦，實不適于今日抗戰殺敵，直至二十五年四月，始因寡不敵衆，且與中央剿匪軍失去聯絡而退入宜川，與紅軍接上不共戴天之仇。紅軍曾懸萬元賞格，

索何之頭。及何退入宜川時，所率隊伍，已犧牲十分之八，僅餘六十餘人，駐紮宜川，紅軍以何部消滅不易恐爲後患，乃實行收買政策，賄以重金，誘何率部叛黨投誠。何亦拒絕，紅軍羞惱成怒，決對何部作最後的武力威脅，圍戰於秋林等地，何以數十人之兵力，使紅軍疲于奔命，屢戰屢敗，犧牲頗重，紅軍自此，亦不敢再有圍犯之意。雙一二事變結束後，紅軍所盤踞地區的人民及地方團隊，均紛紛以共黨有「放棄階級鬥爭」之表示而返里，何某仍執意不返，蓋因已與紅軍結下死仇，恐遭紅軍不測之毒手，他說：「紅軍對富家子弟及地方士紳，在已往是以資產階級上措詞殺之，現在雖在表面上取消了階級鬥爭，但他們還可以以其他罪名殺人，或暗中謀害，總之：已往有飯吃的人，還是不能在家鄉安居樂業，歸之何益？共產黨一日不離開陝北，我何某即使餓死在外，也不受這批人自欺欺人的愚弄。現在我的生活，幾乎是等於要飯的了，但是家鄉屢次催歸，我仍然置若無聞。」

最後，他向我說：「我雖然已經窮到這步田地，可是我的骨頭是硬的，氣血是熱的，父母妻子遭人屠殺之仇一日不報，何某之志氣便一日不消！」

不錯，他是個「入窮骨硬的鐵漢！」

十、所謂「統一戰線區」的作風

陝北，是中共所聲嘶力竭而高唱的「民族統一戰線區」，然而這招牌，也正像專門賣

「秘製金丹」，或「應傳九散」的「金丹」，藥子儘管好看，金丹還是假冒。因為他們是祇會這謊言，竊大衆，而且專長于粉門劇，誇人上當。我們知道：所謂「統一戰線」者，中共自補自唱的說是「不分派別，不分黨系」在「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則下，集中起來共同抗日。這個解釋，本來應該是說處于中華民族空前未有的國難的今日，全國同胞，均應「意志集中」，「力量集中」，以「軍事第一」，「勝利第一」，「國家至上」，「民族至上」，作爲目前抗戰總樞的最高準則。由此口號而論，中共理應自覺，確認自己是黃子孫，同有克敵制勝挽救國運的任務，應該把以往那種反動行爲，破壞工作，即日停止，同爲「抗戰建國」的神聖使命而努力。這個原則，對於中國現實的需要上，可謂迫切已極，早爲全國同胞所眼睛睜睜的熱望着的。所以當中共宣言信仰三民主義，取消蘇維埃組織及擁護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和決議案時，沒有一個人不爲之慶幸欣歡，沒有一個人不欽佩中共勇于改過的自新精神，以爲中國的行政組織，從此可以統一，——三民主義新國家的總設，從此可更增加其成功的可能了。內患既消，外敵何難蕩平？這也是中共在他歷史的任務上，必然產生的一個新轉變，這個轉變，實緊繫國家民族的存亡絕續；但是不幸！連「可歌」的美事竟然叫人「可泣」。中共的合理轉變，竟高掛其羊頭而大賣其狗肉。今日陝北縣政的受牽掣受阻礙，不得不令人對於中共的轉變，認爲是不誠懇與不徹底。

（下略）陝北的各縣政府，共產黨並未敢言拒絕，而且各縣黨部，共產黨也未曾明白反

對，縣政府和縣黨部的機關仍是和別地一樣的存在着；但是共產黨用種種的方法，來阻撓黨政工作的推行，他所承認的縣政府，和縣黨部是只准在這個區域裏吃飯，而不准在這個區域裏工作。例如：過去的延川事變，便是一個鐵的證據，他們所利用的方法是甚麼呢？我不妨舉出幾點事實來說一談：

【一】武裝戒備 陝北二十三縣中，每一縣城中最少也駐有一連八路軍，四鄉和各重要路口駐守地軍隊，不在其列。共產黨對於政令的推行，與政治的實施無不以軍事武力為後盾，各縣除省政轄屬的縣政府以外，共產黨仍存在其「邊區政府」組織，並設置縣政府，形成了陝北「縣政二重化」這對於「一個政府，一個領袖，一個主義」的建國原則，完全相背而馳。特區的行政機關因為有武力作後盾，便壟斷財政民政一切其他政權。縣政府的公文，只能行在大門以內，不能通到大門以外，雖然我們知道陝北的捐稅比關中及陝南，還要加上五倍，可是這些歲收，政府並沒有拿到一分一文，完全被共產黨抓入在「特區政府」裏，所以各縣縣政府存陝北，成了門裏的大姑娘，一天給兩頓飯吃，什麼都被剝奪了。除此之外，為着造成民衆與政府的隔閡及防止政府權力的伸張，共產黨還要對各縣政府縣黨部作武裝戒備，凡是民衆，誰都不能進縣政府及縣黨部的門裏；否則，一經駐軍查出，便有漢奸「？」嫌疑，把民衆監禁或者甚至與以秘密的嚴刑。這樣，政府是時時處在受束縛和監視之下，而不能發揮行政的效能。中國共產黨假使尚有良心存在的話，他們應

該爲國家民族，把自己反省一下，這是不在是「團結禦侮」？是不是在執行「統一戰線」？是不是服從三民主義的領導？是不是爲「國家的獨立民族的生存而努力」？更是不是在「製造摩擦」？「加緊摩擦」？

（二）農民暴動 談起這個口號，人人都以爲這是中共早就放棄了的一種政策，這可像是八九年前共產黨盤踞在湖南時的一個過去時代的名詞。而且毛澤東先生也曾經幾番檢討過去農民暴動手段的錯誤，而且要糾正這個「革命方式」。可是這種手段，爲什麼到現在的「統一戰線」時代，中共還仍在使用着而且還要發揚其精神與實際呢？原因就是這樣：中共因爲自己唱出了「統一戰線」，「服從國民政府領導」的種種好聽的口號，而實際上對於政府在西北設立縣政機關，又認爲是「必須絕對削弱其力量而使之形同虛設的」，這對於他們所高唱的「統一戰線」，是根本無執行和服從的誠意的，且也是極端矛盾的，他們仍把西北作爲其黨的私產，因此便不得不由「外勤」而「內勤」，加緊欺騙煽惑民衆的工作，慫恿中國農民反對政府，不給政府納稅，說西北各縣政府，都是「魚肉鄉民的貪官污吏」；並且鼓動人民，和縣政府起衝突，武裝示威，他們一面把八路軍喬裝過來現混入真正的民衆之中，擴大事態，造成農民暴動，一面又說與他們無干，這是民意的表現，「？」並不是中共不服從政府與不擁護中央，在毛先生主下西北共產黨的口號與行動，其外表與內幕，是這樣的。

【三】破壞保甲組織 因為中央竭其心力，使民衆和政府脫離了政治關係，所以保甲組織，在西北根本就辦不通，因為保甲絕對不能設在縣政府內。可是縣政府對門外的事，又根本管不到，如此使縣政唯一基礎的保甲組織，一步也難推進，而一方面共黨又在民衆中挑撥，不准民衆任保甲長，如任者便以長凶狠陰險的手段對待。在神木縣，有三十多個保甲長，先後遭受暗殺。他們在表面上也申說並不阻止縣政府的組織保甲，可是實際上，卻使縣政府不能任用一個保甲長，建立保甲幹部。這種辦法，是完全使用黨統制羣衆的手段來壓制縣政工作的發展的。民衆等本身，並不是不願服從政府，受政府的領導，只是在共黨欺騙，煽惑，高壓，陰險的手段之下，使他們不得不和政府脫節。所以在西北二十三縣中，雖認有縣政府的存在，但沒有一個已經完成了保甲組織。同時也沒有一個，有十個黨員以上的黨務機關。凡是到過陝北的人，都說這三件事實，而這些事實，則又誰也知道是「革命專家」？毛澤東先生所說「革命專家」，我現在談談的意見。毛先生能勇于改過自新，切實「服從國民政府」，對付中央的精力，替而對外。這樣，就是「抗日高于一切」，也就是「避免摩擦」，「國共合作」，「抗日救亡」。毛先生既不是「托派漢奸」，決不願「破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到這樣地步，他且一錯到底，執迷不悟，專替敵人做不利于抗戰的工作的。其次，我更希望政府任西北各縣急積極加強統治工作，健全縣政機構，鞏固抗戰建國的後方基礎，凡是對國爲服從，陰謀反對，煽惑和挑撥人

民，脫離政府，破壞抗戰建國的禍國份子，一律是最嚴厲的手段，去制止並防範其運動，這在團結禦侮，力量集中，求取抗戰最後勝利上，都是切要而必須的工作。

十一、陝北的青年大本營

人人都知道：共產黨目前，是為民族解放運動在培養青年幹部，各地的青年，因為共產黨的誇大宣傳，有很多都跑到西北去的，他們想以那裏的教育，把自己造成為「救國專家」。有許多青年男女，都夢想到西北的美麗，尤其是中共各宣傳機關，往往以「西北是全國青年大本營」的美名相號召。如今有千萬遠途的旅客，在到了西北之後，垂頭喪氣，傷心着，後悔他們自己已經誤上了「賣膏藥者」的「洋當」，陷入于不能回途的苦境，誤了救國的途徑，因之精神頹喪，神經麻木，較重者，則以自殺；輕者，靜坐療傷。他們（或她們）叫這「大本營」為「老虎籠」，因為一入籠中，國人的事業前程，自由幸福，便完全被禁錮操縱了，只有聽人捉弄，聽人擺佈，再也翻身不得。

陝北的教育機關，規模較大而聲譽較著者，計有西北公學，抗日大學，魯迅藝術學院，馬列大學，及摩托學校五處。其中馬列大學，係最近創辦，抗日大學，即已往在江面的「紅軍大學」的變名；西北公學為共黨到西北以後所創設的；魯迅藝術學院，亦係近二年來的產物；只有摩托學校，歷史比較長久，但較之「紅大」亦晚，已經沒有這個學校的名

義，不過他的性質是收容各種技術人材，這學校其實早就存在，只是到了西北之後，才開始掛上了「摩托學校」的牌子，藉以收容各種技術人材，入學受訓後，分別任用，最普遍的就是汽車駕駛及印刷司機各技術，其他航空人材，還談不上，所以以上五校，惟有該校性質，較為偏重技術的教育，除此以外，便都成了中共中央的黨校，處處都在厲行共產黨的「黨化教育」。

西北公學，是共產黨灌輸青年共產思想初步教育機關，較之抗日大學，低減一個程序，最初入黨受訓的青年，大多先入西公，而後再入抗大，進抗大之後，經過中共長期的考核，並選拔了中共的忠實黨員，成績最優，能力特佳者，始予千人之中，選拔一二，進入抗日大學，故馬列大學的學生，多數都是其黨中略具浮名的人，如謂共產黨所認為「熱情的犧牲」，「丁玲之流」，始有資格進入該校受訓。總之：這學校，是共產黨的高級幹部製造廠和灌輸地，該校公為其黨的外圍學校，抗大為其黨中層學校，到了馬列大學，才算入其黨的內層，——然而並非核心組織，仍是彼輩配附級。其他短期訓練班——如已往三原的「陽明訓練班」——則是更外層的黨校機關，所以不說共產黨主義，只是講些「民族統一戰線」的套話，論去腐除肌，這些所謂遊擊戰術去引誘人，另一方面，替陝公或抗大吹牛皮，使一個青年之不瞭解他們的「毒化共產主義」的陰謀者，死心塌地的相信共產黨是抗日救亡，信奉三民主義，而後再一步步的被引誘走入共產黨的五花八門的圈套裏。

各學校的學生總數，大約在三萬人左右。管理的方法及學校組織，大致略同，均係軍事。以小組為基層組織，上為分隊及區隊。對於學生的待遇，除每人每天兩顆小米飯以外，每月還有津貼一元，至于吃菜，每八人或七人，能吃到一碗蔬菜豆腐之類，便是最優的生活。所吃的小米，俱是由自民衆的救國公糧。津貼費一元，雖然名義存在，但實際上多被一般發給指導員及隊員捐入到學校去，很難領到學生的手裏，學生住的地方，都是強佔老百姓的窑洞。

膚施及延安，是個偏僻破落的城市，人烟稀少，市面蕭條，本無許多地方，容納外來青年，共黨沒辦法，只得把民間窑洞強迫佔領，與衆究遷搬到什麼地方去住，中共便不去過問，一個窑洞，往往住二十餘人，空氣的呼吸，大感窒息，不過因為男女合宿及××自由的緣故，一般青年，雖住在這樣委曲的地方，因之也不感到什麼不滿，而且若干青年們的心，有因此而被收買的。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這個心理，形成了陝北青年的普遍性，也造成了一般共黨求愛的青年男女結綰跑往陝北去的中心目的，有人以為中共是極尊重女性人格的，把女人比做花呀月呀當做玩物的那等意識，在延安，未必會有，那未免對中共總有過高的理想。在「特區」，在中共的領導人，雖然嘴上有時會這樣說，筆下有時會這樣寫，而實際行動和設施，却往往會適得其反的方向。毛澤東的四易其妻，于今年春開棄其相從長征（？）丁二萬五千里（？）飽受艱苦的患難妻子賀志珍而與海上影星

藍蘋結婚，固然可以知道中共領導人尊重女性的程度到怎麼地步，而把陝此的女性隊部所在地特地標爲「看花宮」，給加上了一個含有深重的浪漫豔蕩而又十足帶有封建意味的特殊標記，更可以知道中共對女性，究竟是怎樣的看法而是否尊重女性之地位了。『到「看花宮」去省看花嗎？』在陝宮的一般區隊長與指導員的口中，你是常可以聽到的，這在那裏，是和我們彼此相見面時互相問好一樣平常，無足爲異的了；至于區隊長和指導員的以居高臨下的地位向女同學們進行脅迫式的戀愛，或者間而要求比戀愛更進一步的事，那幾乎也和吃飯一樣平常。因此，真正知道自己尊重自己的地位而願意隨便隨時供人爲愉樂品而知道自愛的覺悟女性們，往往痛切悔恨她們自己當初輕信中共的虛偽欺人宣傳，而有設想種種方法中途脫離的；可是在邊區的勢力圈內，能夠讓學生（不論陝公，抗大，或者魯迅藝術學院。）離去的，很少很少，一入其門，那人的動向行止，便被嚴格的拘束縛縛了，因此，在失望，忿恨，痛苦之中過着不安而又無可奈何的生活的女性真很多。

其次談到穿的衣服，按照校方的規定，衣食均由校方供給，但是實際上只不過每人一身單粗灰布衣服，而且是老百姓縫的，不三不四，大小七稱樣子，這樣一來，有錢的學生，自然是無虞不給，無錢的，只有求人幫助了。學校當局，原來雖也曾允許給窮苦的學生發棉衣；並且也曾通知沒有棉衣的學生向學生會組織股去登記，然而一般政治助理員總是多方挑剔使領棉衣着的範圍縮小到極度，祇不過給一些加入共產黨的學生，都穿上了棉衣。

，但其餘的人，沒有衣服，就得活活凍死，這般政治助理員沒有辦法，就發起什麼「親愛互助運動」，要有錢的同學，捐贈棉衣。要這一套工作的把戲，結果還能夠在親愛互助原則下，求得一些幫助，至于校方則雖無結束，但却不再管學生的死活了。

在陝北求學的青年，所感到最大的痛苦，莫過于身臥病榻，無人過問。凡是患了病的學生，都會傷心得流出淚來。校方在名義上是把病榻移到衛生處，實際上衛生處便是一個「催命處」，不到衛生處去的學生，或者病輕時受些痛苦，不至死亡，而送到衛生處後，一則沒有好大夫，二則沒有藥品，病重的與病輕的往往都混住在一個泥坑上，如此，病輕的人，可以因傳染而得重病，病重的人，就只有臥着等死而沒有別的法子，在這大本營裏的青年，在沒有病的時候，雖可以自由的游覽一兩個女同學去逛逛，不愛上課時，就可以不上課，任意外宿，無人過問，但一遭病時，便要「活受罪」與「受活罪」了。因此，在害病時，沒有一個人不是灰心喪氣，恨不得一時離開陝北，不過一到病愈，便又苟安起來。

八往往這樣說：「早晚脫離都是一樣，何不再在此多逛幾天！」由這一句話裏便可以知道，日的青年大本營，只不過是一個情場，不是一個場，不過是一個場，只不過每天與上兩頓飯，拿着女人開開心，開會時，叫幾聲「中國共產黨萬歲！」「毛澤東萬歲！」就靠抗日救亡與究竟馬列了。

他們所學的課程，不外共產黨平常所唱的一些口號，最主要的是：（一）社會科學；

(二)中國問題；(三)遊擊戰術；(四)民衆運動；(五)唯物辯證法；(六)中國共產黨綱；(七)中共革命史略……等。「社會科學」的內容，本應包括政治，經濟，……而他們所講的，只不過是馬列主義。其分配的數量，馬克斯，列寧與階級……等理論，各佔三分之一，其結晶體，便是「如何爭取農民，以求奪得政權？」「中國問題」的內容，是說明中國共產黨的決心抗日；統一戰線，其結論是將下中共，才有了抗日，所以抗戰建國的領導責任是在中國共產黨身上，中國共產黨爲了增加抗戰的力量，減少國內的磨擦，才歡迎中國國民黨的協助抗日。這個理論，無異說：只有中國共產黨是抗日的，而且只有共產黨才能夠抗日，其理論之是否說謊，請讀者自己去想吧。「游擊戰術」的內容，不外以下四點：(一)游擊戰術是萬能的革命戰術；(二)游擊戰術是中共十年的鬥爭創造出來的；(三)宣傳共產黨戰鬥史；(四)不是中國共產黨的遊擊神迅，華北抗戰早已一敗塗地。總而言之，只是彼多子理論，誇耀多于實際，並不會真正把遊擊戰的原則說出來，只吹些大話，使人知道紅軍戰術是萬能的而已。「民衆運動」的內容多取之于列寧主義的爭友民衆等。「唯物辯證法」的內容，是曲解民生主義是列寧主義。「中國共產黨的黨綱」我不曾看到它的講義內容，而「中共的革命史略」，則內容更爲謬誤之至，竟謂「北伐」成功是中共的力量，蔣委員長領導黃埔健兒浴血北伐的宏願繼續，殺無遺。有人以爲中共喜吹，而我則以爲這簡直是中共的不要臉！

我們知道西北青年大本營的抗倭救亡，就是這些把戲，他們所謂「爲抗戰建國培植優秀幹部」的教誨目標，也就是這些把戲。要說在殘害青年，惡化青年，口呼抗戰，破壞建國，也不謂過。我想凡過來會過共黨的「政治陰謀」所腐蝕了的人，決沒有人不以爲然的。

十二、從陝北歸來的青年男女

在西北的青年大本營裏，究竟是幸福呢，還是苦惱呢？那我在前篇，已經把他們的生括給大家介紹過了。總而言之，除了「英雄氣性」而善好苟且偷安，沉溺于情海愛網的青年，認爲尚可留戀外，——但也說不上是「幸福」。——一般奮發有爲，爲了救亡抗日而投奔陝北去的青年，沒有一個不是苦惱，失望的。失望的原因，第一，在於共產黨的只有虛偽宣傳，沒有實際內容。他們對外宣傳，把陝北說的比任何政黨任何國家政治的組織，都要完美，誘惑青年，幾奈「邊區」，及至身入其境，却是黑暗，腐敗，滿佈着陰森之氣，把一個活潑的青年，當作一隻羊來教訓，要你勉強的捧馬克斯，列甫，毛三爺，朱二哥的場；當作一頭牛來利用，凡使不信奉共產主義的人，要你整天整夜搬石頭，而且美其名曰「培養勞工性」。搬石頭做什麼用呢？別的沒有，是培養「勞工性」。什麼抗日救亡，一概不提，只消唱的馬列和列馬。「抗日救亡」成了一幅外套，「馬列列馬」成了一件內

衣。這樣怎會不說一般熱血救亡的青年失望呢？第二，是不慣反動生活。何以呢？因為共產黨對於中央的陽奉陰違政策，叫人看了頭痛。青年人的皮氣，是講什麼話，就做什麼事。三民主義，現在已深入人心，社會最大多數青年，說一句話，不承認三民主義是救中國的唯一主義，沒有一個愛國的青年，不期望看三民主義的實現。（除却是漢奸）然而中共却把三民主義當作反革命，另外講一套道理，一套「新民主主義」，隨隨便便的給「三民主義」戴上這不必要的帽子。而實際上，則加以宣傳共產主義，擴大下層組織，動三民主義是說而不信，信而不行，處處自立門戶，破壞統一，分化抗戰力量，強迫青年使行共產黨主義，好像強迫一個窮人去做大土匪小偷一般。這種昧良心的，墮落人格的勾當，愛國的青年，如何能夠過得慣呢？因此，在陝北的一般青年，都有他們裏大的苦惱，懺悔自己已不該誤入了這個苦窠子。

可是這個苦窠子，既經進去，就難出來，要想脫離，只有「開小差」的一條道路，然而多數人因為經濟的不能獨立，自己又不能長途跋涉，（自己的私幣，也都被共產統制起來，說的是代管，實際限制私有錢物，防範逃亡。）「開小差」無路費的只好在這個苦窠子裏當無期徒刑的囚犯了。

然而，意識較為堅強的人，畢竟是不甘受這種長期痛苦的。

「同志們！我們要死裏逃生，脫離這個地獄，重見光明的太陽！」這是陝北的覺悟的

青年們在那黑暗中呻吟。這些女同志，流着眼淚來。可憐啊！一羣上了狡猾的羔羊！

在這種呼聲之下，子月黑星暗的夜晚，有一羣青年男女，從這偏僻的角落，繞着水路，在黑暗中，尋找着那條生路，時而放心，時而驚慌，向內地找尋。因為沒有路，所以求乞，但是他們在求乞中，內心也會感到安寧，認為這「苦」，可以換到無盡的價值，可以把自己從死亡線上掙扎出來。

當我到延安的一天，在一家飯店裏住着，有二個男的和一女的女，身材瘦小，容貌優美，聽她的口音，像是四川人，可是我未便詢問，因為在「救國」的勢力範圍內，隨便說話，儘可以招致無妄之災的；但是她和他們都眼睜睜的盯着我，並不顧着我的臉面是紅着我們的眼睛中的驚悸。過了一會，他們便會很客氣的問我：「先生是從那裏來？」我答以「貴州西寧來。」他們互相唧咕着，好像還說：「他大概是到西安公幹的人，我們可以託他幫忙離開這裏。」說罷，向裏邊望了一眼，似乎是在打聽因還有什麼人會監視着他們。

最後，他們和我商量脫離的方法，要我問他們一道往西安，把護照上多添幾個名字。我明明知道這沒護照，包庇潛逃，這是一件犯法的事，可是當那位女同志哭聲說：「先生能把我們帶回西安，就是救了我們的命，家中一年半沒有來信，寄的錢和信，想都學校查

扣了，我的母親……」使我的心變成一包棉花，我要允許而又不能允許他們看到我有些愛莫能助的情形，便自己想了一個辦法，叫我很不好意思接受，可是爲了救人出火坑，也只好應允，把我所僅有一個毛毯子放回去。這一位男同志，一位姓郭，一位姓祝，二人給我拿了一包小行李，換上了衣服，冒充伙子，那位女的權時假說是我的女人。就這樣決定了一個辦法，帶着他們，出了陝北。陝北的青年男女，是這樣不辭艱苦的脫離這個苦海，這個「青年大本營」，它能抓着青年的什麼呢？

在陝北的歸途上，我所看到的一般青年，大致分爲兩種：一種是朝氣勃勃的向陝北奔奔；一種是垂頭喪氣的向西安回來。還正像八路軍時汽車，一面堆滿貨物，一批一批的運到陝北去，而一面則又一批一批的跑回西安來一般。據郭同志告訴我說：

「最初入了抗大的時候，共產黨天天找學生作個別談話，這是一同去的朋友，或是舊相識的同學，完全設法使他們分離，決不編入一個大隊或是一個區隊里，以防範學生。集體行動，在往北投奔的時候，往往有數十人，可是到了回來時候，最多只能一兩人。郭君和祝君，本來是同鄉，可是因爲不是同時流入陝北的，所以僥倖的編入了同一區隊，而且又巧又是同一小組。那位黃女士，是四川人，郭祝二位同志是漢中人，他們和她因爲沒有鄉親關係與友誼，所以校方不甚注意，日常多在一起，才有這一次隨同逃跑的緣緣，否則，是不可能的。此外陝北的盤查很嚴，人多時，目標太大，行動更不方便。」

我因為瞭解陝北是黑暗地獄，所以在路上每逢看到跑向陝北的青年，常覺得有些過意不去，想勸導他們回頭，可郭君說：

「在每一人羣中，都有八路軍派人帶隊，他們有的住在西安，有住在三原，專門作引導青年的工作。在西安各旅店中都住有這些不要臉的混蛋東西，多持第×戰區的護照，男女均着軍服，冒充軍人，凡是被他們引誘住了的青年，都由他們轉送到第××集團軍駐陝辦事處去聽候發落。女的多半乘汽車，男的多半派人節節護送到陝北去，而且所住的旅館的房飯錢，都由他們代為開銷。就是這樣把一批批青年從睡夢中拉向陝北的苦窰子裏去了。你要勸導，這時不但不能生效力，而且帶隊的人，也是不允許你作什麼勸導的。」聽了這話，更使我感到熱度的不安。

凡到了陝北的青年，第一封信，便是勸告親友同學不要再上陝北，自己苦吃，可最終統方查出之後，並將內容修改，把陝北描寫的十全十美，迷惑人心，這也是最常用的一種欺詐手段。寫字多用鋼筆，字跡優美規矩，藉以掩飾冒名假充。不明白這些把戲的人，往往就上了這樣的當：「因為接到朋友的信而到陝北去，但到了陝北却問不出朋友的下落。」他的朋友不是給學校替他改了名字便說「某某分派到某某地方當隊長去了。」或是「作民運工作去了。」以免兩人見面之後，揭破了共產黨假造信件，誘致青年以及其他種種陰謀。所謂「人格道德」，在他們看去，乃是一般反革命者（？）才須顧到的東西。

從陝北回來的青年，他們吃了多少的苦，可是所換來的代價，便只有一個「自覺的救國」。我在這裏敬告我們中華兒女，致誠摯的忠告：萬一你因受了誘惑而萌動了「到陝北去」的意思想，你得「慎重」！最好去訪問訪問你所知道的從陝北回來的青年男女們，他們對陝北的印象，到底是如何？

十三、別了陝北，「我不願做中華民國的野百姓」！

在這殘廢、錯綜的環境裏，我冒着險，會作三次長途的旅行，是每到一處，所給我的印象，總覺得是一種不滿和牢騷。

經過靈武縣的那天下午，本來我想得到交通鎮休息，因為郭祝二位同志，和黃女士遇着一個相識者，這個相識者是在後方擔任服務的司藥主任趙某，勉強的留我們到他那裏吃了一頓便飯，他並且慨然允許能爲這三位可憐的青年謀一個職業，所以爲了他們的方便計，只好允爲停留一日。

當天夜裏，我就住在鄭縣城內的一家飯店裏，宿舍是又潮，又臭，可是沒辦法，祇得住下。郭祝等都在趙君處辦理找事情的交際，剩我一個人，住在旅店裏，便利用這寂靜的時間，在一顆豆火的油燈下，在一張烏黑油膩的破桌子上寫日記。

『所謂「合理化」的特區，原來是黑暗世界，誰能知道共產黨的心理是到底怎樣來完

成他個革命的主張呢？……」

「……剛寫完這幾句話，三位武裝同志，帽子上綴着一個五角紅星的黨徽，走向我的桌子前面來，開口就問：『同志是那一系列的軍隊？』」

「這六句話問得我無言以答，我不清楚中國的軍隊有幾系，或是有天系，或是地系，或是人系，……這使我莫明其妙，只好答以：『中國系的軍隊。』」

「這這句話說出之後，他們倒反笑了。或許他們認為我的知識程度不夠，所以不懂他們貴政府的口語。」

「……真且記起我悄悄地向塞入袋裏去，他們或許是看到我沒有知識，不值追索，於笑了。……之後，看着我臂章，走開了。一個人低聲譏笑的說：『少校政訓主任！』」

「……等到卡諾多軍，三個青年都來了，他們有些愉快的顏色，工作是找尋塞入袋裏，在後方醫院和趙君一同服務，……我時心中起了說不出來的情緒，一方面為他有了正式職業，……無定的還道他這副家，一方面又為失去三個患難相隨的伴侶而惆悵。雖然他們給了我諸多艱苦，……是趙君的流汗，……趙君的靈敏，……萬萬的活潑，這種種各不相同的風采，……在我的內心深處，使我不能發覺，……戀難捨之情，……這一夜沒有安心的睡覺。……我盡量的安慰她，勸她暫留郵局，……來得到家信後，再設法回國去。」

第二日早晨，我要起身南下了。三位老夥伴，送我出了縣城。到了洛川，又是一個世界，看不到「統一戰線」和「擁護抗日的」，蔣委員長「這些奇形怪狀的標語」。每個人的臉似乎也都不同了。還不同的所在，我也說不出所以然來。洛川是陝西第三行政督察專員區署所在，市面較之宜川，甘泉，鄜縣等地方，都繁榮的多，是洛（川）宜（川）公路的起點，西北公路的中點，交通便利。人煙稠密。在華山麓嶺之中，突出了這塊平原。平原的面積雖小，可是在陝北各縣中，算是獨一無二的平地了。天，比較別的地方，看過去也似乎大了一些；地，比較別的地方看看也似乎有些遠了，心曠神怡，精神爽然！這是我自入陝北第一次的喜悅。

洛川的大街，因為行人擁擠，經常塵土飛揚，南北大街較東西大街為長，飯館有半條家，以羊肉館較多，羊肉的味道有些特殊，沒有多大腥味，所以旅客向羊肉館子的絡繹不絕。我也以四毛錢買了一個羊頭，吃了一頓豐盛的晚餐。

第六戰區兵站總部的汽車，乘坐很不容易。花錢也一樣不能上車，客車每十天還沒有一次。八路軍的「須等幾天以後」才能有一輛載重車南下。我的心中有些着急。明天人坐汽車的希望，又化為輕煙了。徒步的苦已經飽嘗了的我，一步也沒有前進的勇氣，山路崎嶇，到西安須要一星期的路程，愈想心中愈不舒服起來。夜裏，正要出去開近，湊巧遇到了第六戰區司令長官行營的隨行副官田××先生，他

負有特殊任務，到四川去，翌日，可有專車南下，田君並允我搭車同行，南下有望，不愉快的心境，便也立時消失；但一面卻爲黃女士惋惜，失去了這個良機，要是她和我同抵洛川，這次便可隨着田君入川，回返到她的故鄉了。

第二天早晨，我搬着行李，往見田君，田君候我已久，乃邀我上車，以罐頭牛肉及燒餅爲早點。車開得很快，途經中部，蒼松翠柏，隱隱入目，景象青幽，原來這是黃陵之所在，可惜汽車不停，風馳而過，未能一遊，引爲憾事。接着穿過宜君、同官、耀縣，及晚，到了三原。山影遙遠，地勢平坦，村落密佈，烟火繚繞，于夕陽半下之餘暉中，探首四望，天地相接，我是已經「別了陝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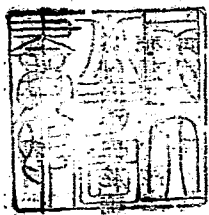
我別了陝北，我也別了陝北雄偉的高山，美麗的自然，骯髒的窯洞，腥臭的土坑，特別的空氣，以及不講人道的政治；但是，陝北的人民，是可憐的！他們處在高壓政治之下而不敢呻吟痛苦，陝北的青年，是煩悶的，他們在監視和統制下過着生活而沒法擺脫。陝北的政治，是虛偽的，陰謀的，黑暗的，他們口喊「統一」，而實際行動上則破壞「統一」；他們口喊「團結」，而實際行動上則努力「分化工作」；他們對外宣傳，「陝北是製造青年幹部的大本營」，而事實上則卻成爲「製造反對任何一切異黨青年幹部的大本營」；陝北的黨魁，天天在操場着「民主」，而事實上他們的一切政令施設，則是完全的高壓主義，而他們自己的腦袋，則滿裝着英雄主義；關於這些事實印象，我一件也不能忘記。

，它們永遠也不會和我腦海別離。

陝北的青年一部份是被霧化了，大部份是在沉默着；陝北的民衆，小部份是已遷徙了，大部份是在痛苦的圈子裏沉淪着。我最不能忘記這麼一句話：

「先生！我們不願做中華民國的野百姓！」

這是一個趕驢子的老漢向我說的。陝北民衆心中的怨氣，就在這句話中，赤裸裸的露揚出來了。讓我借他這句話，做我「西北散記」的「陝北之部」的結束吧。



西安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審查證字五十二號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月初版

西北散記第一輯

神 秘 的 陝 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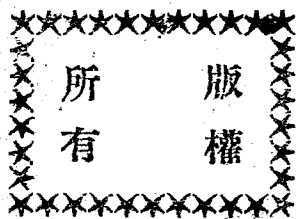
(每冊定價四角)

著 述 者 石 利 之

編 校 者 何 揆 一

發 行 者 西 北 出 版 社

印 刷 者 中 國 文 化 服 務 社 陝 西 分 社



82
106022